

專輯論文

感受他人的「痛苦」： 「底層」痛苦、公共表達與「同情」的政治

袁光鋒

摘要

「留守兒童」問題已經成為當下中國重要的公共議題。在一些公共事件中，這一群體的「痛苦」引發了「道德震撼」和公眾「同情」，推動了公共討論的進行。本文以兩起畢節留守兒童死亡事件為案例，以商議民主理論為框架，討論了大眾傳媒是如何塑造底層「痛苦」的，以及底層「痛苦」引發的公眾「同情」是如何在網路空間中被表達的。研究發現，傳統媒體通過「代理者語言」向公眾呈現了留守兒童的「痛苦」，並賦予「痛苦」以公共價值。「同情」推動了圍繞這一議題的公共討論，公眾的「同情」結構主要包含悲痛、憤怒、諷刺、羞愧、無力感等情感，在表達「同情」時，公眾會徵用現有文化資源和官方的話語資源。採用「我們—他們」的視角，將他者置於與「我們」不同的文化位置，是網民拒絕同情的主要策略。儘管在兩起事件中，媒體和公眾「同情」都引發了較多的公共討論。但政治權力的結構性不平等導致底層群體的「情感體驗」很難獲得進入公共空間的常規管道，「同情疲勞」是這一群體不得不面對的事實。

關鍵詞：同情、痛苦、商議民主、留守兒童、公共空間

袁光鋒，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情感與公共生活、政治話語史。電郵：ygf@nju.edu.cn

論文投稿日期：2016年6月25日。論文接受日期：2017年1月26日。

Special Issue Article

Feeling Other's Pain: Subaltern's Pain, Public Express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ompassion

Guangfeng YUAN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 children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group’s pain aroused a “moral shock” and public compassion in some public events. Two case studies are used to examin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is subaltern group’s pain in mass media and the public expression of compassion in cyber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ory. Mass media represent the pai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rough the language of agency, and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king their pain a public issue. The public compassion aroused by subaltern pain has been an important motivation for public expression, which is structured by emotions such as sorrow, anger, satire, shame, and powerlessness. Netizens use both official and cultural discourses to express compassion. These findings are valuable because they contribute to considering the moral and emotional dimens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Subalterns’ pain is rarely expressed in the public sphere because of the inequality of political power, which inevitably leads to compassion fatigue.

Guangfeng YUA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emotion and public life, history of political discourse.

Subaltern's Pain, Public Express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ompassion

Keywords: compassion, pa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left-behind children, public sphere, subalter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Yuan, G. (2017). Feeling other's pain: Subaltern's pain, public express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ompass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0, 203–236.

致謝

在香港中文大學第九屆「傳播科技與新媒體事件」工作坊期間，本文得到與會同仁諸多珍貴的意見，之後邱林川教授、李立峯教授、陳韜文教授以及匿名評審人為本文的修改提出許多有益的建議，在寫作過程中，黃旦教授、黃佳博士、胡翼青教授、周海燕教授、王辰瑤教授也對本文提出許多富有價值的修改建議，特此感謝，文責自負。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於「情感」視角的當代中國公共輿論研究》（項目編號：16CXW021）的研究成果。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當我們的內心被激發了，我們的頭腦就改變了。」

——克勞斯

導言

「謝謝你們的好意，我知道你們對我的好，但是我該走了。我曾經發誓活不過15歲，死亡是我多年的夢想，今天清零了！」這是媒體報導的2015年畢節留守兒童自殺前的遺書，這封遺書衝擊了人們對留守兒童世界的想像，引起了強烈的輿論回應。留守兒童的議題是當代中國轉型時期重要的公共議題。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我國流動人口達到2.6億，由於入學教育、戶籍制度等一系列的限制，許多流動人口的未成年子女成為留守兒童或者城市的流動兒童。留守兒童面臨著經濟、情感、教育等多重問題，已經得到人們的關注。根據讀秀報紙資料庫的查詢結果，自2006年開始，留守兒童的問題開始比較頻繁地出現在媒體上，2005年僅有215篇報道，2006年為800篇，2007年迅速增加到近3,000篇，2012年之後基本上每年都有上萬篇左右的報道。

事實上，媒體報導出來的留守兒童的「痛苦」只是這一群體生活遭遇的冰山一角。留守兒童問題也是當代中國底層問題的一個縮影。底層的「痛苦」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重要問題。「痛苦」自然非當代中國獨有之現象，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痛苦」。「痛苦」在當代社會的凸顯，與社會轉型的問題以及傳播都有緊密的關係。社會轉型中的問題大致包括貧富分化、「三座大山」、三農問題、環境問題、政府權力濫用問題、下崗失業、拆遷問題、留守兒童等等。背後的原因主要是制度層面的，比如缺乏公平正義的分配制度、戶籍制度、公民權利缺乏保障等。

「痛苦」從個體的體驗走向公共空間，自然離不開「傳播」。自1990年代末以來，底層的「痛苦」就不斷出現在報刊、電視上。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的普及為「痛苦」的表達提供了更多的通道。在新媒體時代，圍繞「苦」而產生的報導、話語、修辭乃至行動，更是成為一種考驗政治合法性的「轟動」。新媒體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與他人之「痛苦」之間的關聯方式，並圍繞著「痛苦」而形成「同情」的社會關係。本

「底層」痛苦、公共表達與「同情」的政治

研究以近年來發生的兩起留守兒童事件為案例，試圖討論底層的「痛苦」是如何在公共空間中被表達的，以及公眾的「同情」是如何塑造公共討論的。

「痛苦」、媒體呈現與公共同情

「痛苦」的政治

作為一種情感體驗，「痛苦」喚起的道德情感在人類社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人類的「痛苦」構成了一部漫長的文化史、社會史和政治史。但「痛苦」不單是個體的一種情感或生理感受，每一個時代的「痛苦」類型都是不同的，布迪厄發現「個體遭遇與社會結構及其變遷之間的複雜關係」，「個體遭遇的困難，看似主觀層面的緊張和衝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會世界深層的結構性矛盾。」（轉自郭于華，2011：2）這意味著個體的「痛苦」常常是社會結構的產物。

現代社會與「痛苦」似乎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繫。威爾金森 (Wilkinson) 指出，「苦難與痛苦始終是現代社會無法忘卻的陰影。……以理性以及快樂原則為主導的現代社會，苦難與痛苦並無存在的意義，但是在否定苦難與痛苦的意義的同時，又不得不面對它們的存在。」（孫飛宇，2007：208）離開了宗教賦予的神聖意義，現代社會的「痛苦」就成為了不堪忍受的東西，因為它已經難以證明自己的合理性。

從威爾金森的論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現代社會與「痛苦」的密切關係並不主要因為現代社會製造了更多的「痛苦」，而是在於現代社會中人們關於「痛苦」的觀念發生了轉變。當「痛苦」逐漸脫離了宗教意義上的規定與個體層面的歸因時，「痛苦」就成為考驗政治合法性、社會公正的因素。「痛苦」可謂以進步和幸福為主要承諾的現代社會的「不和諧聲音」。

人們對「痛苦」的認知和評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痛苦」進行的「歸因」，這反映了人們對「痛苦」來源的不同理解。以中國為例，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遭受欺壓的人們也會把「痛苦」的原因歸於官員或天災，但一些日常化的「痛苦」卻常常被視為「命運」，「『命』的觀念讓人們接受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既有的結果，接受他人成功和自己失敗的結果」(盧暉臨，2006：154)。苦難就被視為一種命運(郭于華，2011：5)。

共產主義革命通過「訴苦」的機制建構農民的階級意識。「訴苦」改變的就是農民對「痛苦」原因的認知。「痛苦」不再是神秘的命運或因果輪回，它有具體的生產者，即地主和其他剝削階級。改變「痛苦」的動力也就來自於對剝削階級的革命鬥爭。可以說，「訴苦」將「苦」的「儒學結構」轉化為了「革命結構」，並且這一結構成為了裴宜理所言的「雙刃劍」(裴宜理，2001)。

與「痛苦」歸因的轉變相伴而行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雙重承諾」。第一是關於工人農民「解放翻身」、「當家作主」的承諾，這承諾了工人農民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地位。第二個承諾是在民生領域做出的，比如公平、共同富裕、小康等。但現實中不少工人和農民卻成為社會的底層和弱勢群體，他們的痛苦構成了對政治承諾的挑戰。在不少涉及工人、農民等群體的事件中，徵引中國共產黨的「承諾」成為公眾進行批判的重要方式。這也是理解當代中國「痛苦」表達的重要框架。

「痛苦」的媒體呈現

媒體對人們如何感受「痛苦」、如何認知「痛苦」具有重要的意義。人們對遙遠地區的他人的痛苦感知依賴於媒體(Moeller, 1999, p. 3)。桑塔格認為，觀看其他國家的災難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經驗(Sontag, 2003, p. 18)，這種經驗自然與媒介技術有關。媒介技術縮短了我們與遙遠地區人們「痛苦」的距離(Manthey, 2011)，它把遠處的苦難帶到觀眾面前(Chouliaraki, 2008)。關於「痛苦」的媒體呈現的研究已經有了較為豐富的成果。

媒體對於事件的呈現是根據特定的新聞框架，新聞框架建構了事件的意義以及人們對事件的認知(潘忠黨，2006)。顯然，對於「痛苦」的傳播而言，媒體也具有「框架」的意義。媒體如何呈現「痛苦」，如何對「痛苦」進行歸因，會影響人們對「痛苦」的評判和認知。媒體並不僅僅是把遠處的苦難提供給觀眾，媒體同時也影響觀眾的感受、思考以及行動(Chouliaraki, 2008)。Chouliaraki指出，在對他者「痛苦」的

「底層」痛苦、公共表達與「同情」的政治

呈現中，西方媒體傾向於對遙遠的他者做心理分析 (psychologize)，選擇把遭遇苦難者的恐懼、危險或身體痛苦作為主題以吸引旁觀者，結果對苦難採取行動的需求淪為簡單的煽情主義 (sensationalism)，這反映了當代西方社會生活中的「自戀」，塑造了個體的情感世界的體驗 (Chouliaraki, 2006, p. 210)。

關於公眾對媒體「痛苦」呈現的反應和詮釋的經驗研究還非常缺乏 (Höijer, 2004)，但也有一些研究成果。有學者通過民族誌的方法考察了公眾對他人「痛苦」的反應。Ong 使用民族誌的方法分析了在階級分化的菲律賓電視受眾對「苦難」報導的反應。Ong 在該研究中討論了媒體對苦難的傳播與「世界主義」倫理的問題，質疑了媒介促進社會團結的能力，Ong 認為，在菲律賓，「痛苦」的媒介傳播並沒有培養一種超越階級的社會團結，富有的受眾對他人的痛苦視而不見，而貧窮的受眾認為自己也是被剝奪的，因此不能對他人的「痛苦」負有責任 (Ong, 2015)。Moeller (1999) 認為美國的觀眾並不關心媒體報導的人類苦難。Höijer (2004) 考察了面對遙遠地區的「痛苦」，公眾不同的「同情」反應，以及公眾使自己遠離 (turn away) 他人「痛苦」的策略。我們在下文還會對此進行論述。「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是這一領域非常重要的議題，得到許多研究的關注 (Robertson, 2008, 2010)。其中，Kyriakidou (2009) 以焦點小組的方式考察了媒體對遠處痛苦報導中的「世界主義」與受眾的話語反應，這一研究發現「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受眾的話語中同時存在和交替出現，「國家」塑造了「世界主義」的話語。

「痛苦」也是弱勢的底層群體進入公共空間的「媒介」，Cho (2009) 以韓國的幾起自焚事件為例討論了底層群體如何借助「身體的痛苦」獲得輿論的關注。底層群體難以通過哈貝馬斯所說的「理性」進入公共領域，「身體的痛苦」就成為他們政治參與的重要管道。

同情與公共同情

人們對他人痛苦的感知依賴於一種「同情」的能力。這裏的「同情」指的是「empathy」，即與他人的情感共鳴。借助「同情」的機制，我們可以體驗到他人的喜怒哀樂，與他人同悲同喜 (休謨，1980：406)。在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同情」機制的作用下，「痛苦」便獲得了主體間性的意義。

他人的「痛苦」還會引發人們的憐憫，這種情感也可以稱為「同情」，此處「同情」指的是「compassion」，本文也是在這種情感意義上討論「同情」的。需要說明的是，英文表達中，與「compassion」相關的概念還包括「empathy」、「sympathy」，但 Höijer (2004) 指出，它們並不像「compassion」一樣包含公共和政治的維度。

納斯鮑姆 (Martha Nussbaum) 持一種認知主義的情感立場 (左稀，2013)，她認為情感是關於價值的判斷 (judgments of value)，判斷對於情感而言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充分的 (Nussbaum, 2001, pp. 19–48)。「同情」這一情感往往與人們關於什麼是不幸、不幸的程度、不幸是否應得、什麼是值得同情的事物等認知和判斷有關 (Nussbaum, 2001)。因此，「同情」事實上是一個包含情感和認知的反應 (Höijer, 2004)。本文也是在這一意義上討論「同情」的。

「同情」並不是中立的情感，而是被社會建構的 (Chouliaraki, 2006, p. 11)。人們認為哪一類群體更值得同情、在一起具體事件中哪一個體更容易產生同情，這些都與政治、文化的建構有關。例如有研究以「辛普森」案為例，指出種族、年齡、性別、收入、教育等因素都影響了公眾對辛普森的同情 (Enomoto, 1999)。大眾傳媒對於「同情」的建構性作用得到學界的關注，尤其是遙遠地區的戰爭、災難所引發的「同情」。

面對他人的「痛苦」，人們的「同情」有不同的形式 (forms)，Boltanski (1999) 指出三種情感反應，即譴責模式、煽情模式與審美模式。在這一研究的基礎上，Höijer (2004) 在討論全球同情的話語時指出，在他討論的受眾反應中，第三種形式是很難見到的，但還有其他兩種 Boltanski 沒有發現的形式，一起構成「同情」的四種形式，慈悲的同情 (tender-hearted compassion)、充滿譴責的同情 (blame-filled compassion)、充滿羞愧的同情 (shame-filled compassion) 以及無力感的同情 (powerlessness-filled compassion)。本文接受 Höijer 的劃分，並以此來考察中國公共同情形式的問題，在此有必要對 Höijer 關於四種形式的定義做簡單的介紹。

「慈悲的同情」關注的是受害者的「痛苦」以及旁觀者的憐憫反應，比如「當我看到難民的時候我的心碎了」。「充滿譴責的同情」帶來的是憤怒，這種憤怒可能直接針對「施害者」。「充滿羞愧的同情」看到自己

「底層」痛苦、公共表達與「同情」的政治

舒服生活以及別人痛苦而產生的矛盾情緒，它可以導致對自己的怒憤。「無力感的同情」是自己在減輕他人「痛苦」上面的無能感 (Höijer, 2004)。本文將在這一劃分的基礎上討論中國公眾面對他人「痛苦」時的「同情」形式。

媒體對「痛苦」的報導並不意味著能產生良好的效果。不少研究指出「同情疲勞」(compassion fatigue) 的問題 (Moeller, 1999)。「同情疲勞」認為公眾被媒體關於他人痛苦的報導淹沒，導致注意力短暫以及對新聞的厭倦 (Moeller, 1999, p. 2)。當然，也有研究以大眾對於「無家可歸者」的輿論為例，認為基本上沒有證據證明大眾失去了同情以及不願意出台政策幫助這一群體 (Link et al., 1995)。

關於媒體和公眾同情的研究多關注媒體對於「痛苦」的呈現能否促進人們之間的團結、能否促進人們對他人痛苦的幫助以及「同情疲勞」的問題。但「同情」的意義不僅在於它能夠促使對他人的「痛苦」採取行動，在一些文化中，公共空間中的「同情」本身還具有規範能力。林郁沁 (Eugenia Lean) 以民國時期「施劍翹復仇案」為例討論了民國時期「同情」作為一種集體情感的興起以及公眾「同情」所具有的規範能力 (normative capacities)。在這起事件中，公眾「同情」不僅「召喚」了民國公眾的主體性，並且還挑戰了政治權威和法律權威。這一研究也指出建立在「同情」之上的「公眾」是不穩定的，容易被政治操縱 (林郁沁, 2011)。

在當代中國公共空間中，「同情」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楊國斌討論了網路事件動員中的「悲情」(sympathy)，指出悲情動員的事件多涉及弱勢群體、社會不公和貪污腐敗。「悲情」常常伴隨著憤怒、震驚等情感 (楊國斌, 2009)。袁光鋒以「夏俊峰案」為例，討論了在這一事件中媒體和公眾的「同情」是如何與司法互動的，該研究指出，媒體和公眾通過「同情」的表達建構批判性的話語空間。但「同情」又是不穩定的，內部是容易分化的 (袁光鋒, 2015)。

關於公眾「同情」的研究成果已經較為豐富，但尚缺乏對公眾是如何表達「同情」的分析。公眾的「同情」表達往往蘊含著對事件的認知和評判以及表達這些認知和評判的話語框架。公眾表達「同情」也會借助某些文化資源或話語資源，這些資源植根於特定的文化情境，離開了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對該文化情境的瞭解，往往就難以理解公眾表達的含義，比如在畢節留守兒童事件的新聞跟帖中，廣東惠州網友說「哥要連續看兩月的新聞聯播才能平復此刻的悲傷」，這裏的「新聞聯播」就隸屬於中國的政治情境。本文將會對公眾表達「同情」的方式、話語框架和文化資源進行分析。此外，現有文獻還缺乏對「同情」與宏觀的權力結構之間關係的探討。本文也將會對這一問題進行初步的討論。

理論框架、研究問題與研究設計

理論框架：商議民主

在政治學的相關領域中，「情感」常常帶有灰暗的色調，思想家擔心「情感」會損害理性以及有可能帶來政治的激進化。與人們對情感的想像相反，「理性」常常被認為是良好政治的根基，是人類具有的獨特能力。「在現代歐洲的思想中，社會進步經常被描繪為啟蒙理性代替非理性情感的結果。」(Heins, 2007) 在自由主義的理論中，情感通常也被認為是理性、合理性甚至民主的敵人，被譴責為「壞的東西」(Wahl-Jorgensen, 2013)。這種關於情感與理性的理解影響了人們對於民主政治、公共生活的想像，例如關於商議民主的討論。

作為民主的一種形式，商議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 強調公民之間討論和辯論的重要性。無論是在規範哲學還是在經驗研究領域，商議民主都已經得到極為豐富的關注。其中，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和羅爾斯 (John Rawls) 的商議民主理論應該是最廣泛接受的。儘管兩者之間存在著諸多差異，但在對「理性」的強調上是一致的，強調個體的理性能力在公共討論中的重要性，「在此語境中，情感性的語彙容易被貶抑為『非理性』而無容身之處」(吳介民、李丁贊, 2005)。但在克勞斯看來，其實無論是哈貝馬斯還是羅爾斯都並沒有否認「情感」的重要性，他們都認為忠誠、正義感等情感對於公民商議和正義的穩定具有重要作用，只不過無論是哈貝馬斯還是羅爾斯都「試圖把情感的作用限制在應用領域，而規範辯護本身則被設想為某種超越情感影響的理性的功能」(克勞斯, 2015: 3)。

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反思商議民主理論的理性主義問題，重新評價「情感」的意義。但重估「情感」的價值，不能依然在「情感—理性」二元對立的邏輯內進行，好像非此即彼。我們應該超越這種二元框架，重新考慮情感與理性的關係（袁光鋒，2016）。「帶感情的，並不是非理智的」（楊國斌，2009）。林郁沁也問到：「高度商業化的傳媒和高漲的大眾情緒是否也包含某些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空間的『理性交往』元素？媒體的炒作又如何推動公眾對正義的內涵的探討、對公眾人物醜行的譴責，即現代社會及其公民的正當道德行為的厘定？」（林郁沁，2011：11）另一方面，理智的也並不是沒有情感色彩的。理性與情感無法隔離，例如，在納斯鮑姆看來，「情感包含著有關外在事物的評價性信念」，往往體現了對對象的信念和評價（左稀，2013）。

超越「情感—理性」的對立框架，推進我們對民主商議理論新的認知，這一領域的代表學者是克勞斯（Sharon Krause）。克勞斯在評價理性主義及其各種替代選項之後提出一種「新的激情政治」，這種政治重新打量「情感」在個體判斷和公共商議中的意義。「當我們的內心被激發了，我們的頭腦就改變了」，「情感」會影響人們對事件的判斷。而在公共商議過程中，「情感」亦能激發公眾對公共議題的關切，促進商議的進行，並達到「不偏不倚」的目標。當然，這要求一種包容性的道德情感，其中，所有受影響著的情感都應當受到平等的尊重（克勞斯，2015：153）。

克勞斯也看到，「作為政治秩序之函數的權力不平衡擴大了人們之間所感知到的距離與差異，並可能破壞同情的運作」（克勞斯，2015：4）。道德情感本身具有的局限，尤其是在政治不平等和社會排斥的背景下，無權力者的情感更難以被體驗到。公眾的道德情感受到政治秩序和權力結構的塑造。在權力不平等的社會，一些邊緣群體的情感體驗難以進入公共空間，影響了公眾對這一群體的認知和理解。

克勞斯的超越「情感—理性」二元對立的民主商議理論是本文的理論框架。本文將在這一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重新理解公共空間中的「同情」。本文將首先考察社會建構的主要機構——大眾傳媒是如何塑造和呈現底層「痛苦」的。媒體的報導框架會塑造公眾的認知和同情感。進而，我們將分析公眾「同情」背後的認知因素以及「同情」表達的話語框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架和文化資源。我們將這兩起案例中公眾「同情」所包含的情感、認知、話語和文化資源，稱為「同情」的結構。本文希望通過對公眾「同情」結構的探討豐富關於當代中國公共領域、商議民主議題的認識。

研究問題

- (一) 媒體是如何報導畢節留守兒童事件的？又是如何呈現留守兒童「痛苦」的？
- (二) 在互聯網空間中，公眾「同情」的構成包含哪些類型的情感？在表達「同情」的時候，公眾表達使用了什麼樣的話語框架以及哪些話語資源？
- (三) 圍繞底層「痛苦」而形成的公眾「同情」具有何種「公共性」價值和特徵？它又是如何受到權力結構塑造的？

研究設計

I. 研究案例：畢節留守兒童事件

2015年6月9日，畢節市七星關區田坎鄉4名留守兒童在家中自殺身亡。這4名留守兒童是一兄三妹，最大的哥哥13歲，最小的妹妹才5歲。根據媒體的報導，這四個孩子無人照料，父親時常外出打工，母親離家出走。事發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做批示，要求悲劇不能一再發生，並曾不點名地談到畢節留守兒童自殺事件：「特別是個別極端事件的發生，嚴重衝擊著社會道德底線，刺痛著人們的神經。」(程姝雯，2016年1月28日)

在這件事發生的三年前，還是在畢節這個地方還發生了一起流浪兒童中毒死亡的事件。據媒體報導，2012年11月16日，畢節市七星關區一名撿拾街頭垃圾老婦，在一個垃圾箱裏發現了5名流浪男童的屍體，系一氧化碳中毒而導致死亡。5人為三名同胞兄弟之子，分別是陶中井(男，12歲)、陶中紅(男，11歲)，父親陶學元；陶沖(男，12歲)、陶波(男，9歲)，父親陶元武；陶中林(男，13歲)，父親陶進友(中國廣播網，2012年11月26日)。

「底層」痛苦、公共表達與「同情」的政治

這兩起事件都發生在畢節，都與留守兒童有關，並且兩起事件常被媒體一起提及，因此本文把這兩起事件一起作為分析案例。之所以選擇這兩起案例，原因如下：

(一)**「道德震撼」(moral shock)**：道德震撼被界定為一種眩暈的感覺，當事件或資訊向人們展現的世界並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時，這種感覺就會出現 (Jasper, 2011, p. 289)。2012年畢節留守兒童垃圾箱死亡事件已經超出了人們對留守兒童世界的想像，而2015年的畢節留守兒童自殺事件更是突破了人們的心理底線，帶來「道德震撼」，「愈是觸及公民道德底線的事件，愈具有震撼力，也就愈能打動人們的情感，形成網絡事件的可能性愈大」(楊國斌，2009：60)。這兩起事件可謂我們觀察底層「痛苦」與公眾「同情」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這兩起事件都在媒體和互聯網中引起了強烈的輿論反應。例如，2013年1月25日，貴州畢節5名流浪兒童垃圾箱取暖中毒死亡事件入選「2012年十大公民事件」，該評選是由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陽光文化基金會、浙江敦和慈善基金會聯合舉辦的，入選理由是：「這種悲劇不應屬於這個時代，農民工現象，戶籍制度，藍領工人的薪酬水準一起造成了貧困農家子弟的不幸。但願我們的社會不再冷漠，不再健忘，用公民行動和制度建設校正畢節慘劇的社會扭曲。」互聯網上也成立了「貴州畢節5名垃圾箱死亡兒童紀念館」。

(二)**官方回應**：這兩起事件也都引起了官方的回應。畢節留守兒童自殺事件發生之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出批示，要求悲劇不能一再發生，畢節市委和七星關區委也對相關責任人進行了處理。2012年的留守兒童垃圾箱死亡事件，畢節市委和市政府對一些部門和人員進行了處理，多名官員被免職或停職(新華網，2012)。

(三)**留守兒童議題**：這兩起事件都屬於留守兒童議題。留守兒童議題與農民工、戶籍制度、教育制度、城鄉問題等都有關，在轉型中國諸多公共議題中佔據重要的位置，因此，留守兒童議題可謂觀察中國底層「痛苦」的重要切入口。

II. 資料來源

(一)**相關媒體的報導資料**：本文借助「讀秀」資料庫獲得媒體關於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這兩起事件的報導文本。由於這兩起事件影響較大，在事件之後很長時間內，媒體反復提及。根據本文的研究目的，我們將時間範圍限定在事件發生之後的一個月，選擇一個月的報導文本。搜索結果顯示，2012年11月16日至2012年12月16日之間，媒體關於畢節留守兒童垃圾箱死亡事件的報導共有256篇。2015年6月9日至2015年7月9日，媒體關於留守兒童自殺事件共有媒體報導879篇。搜集所有文本之後，我們先縱觀整體，獲得報導的整體印象，然後選取典型報刊和文本進行話語分析，本文分析的內容主要是話語主體(是誰在講述痛苦)、歸因(痛苦因何而起)以及行動指向(指向什麼樣的社會變革)。

(二)網路資料：關於網路資料的分析，我們先通過搜尋引擎搜索互聯網上的相關資料，然後登陸新浪微博、騰訊微博和一些著名的論壇(如天涯)搜集相關帖子和評論，微博和著名論壇在互聯網公共議題的傳播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通過這兩種方式，我們大致可以獲得關於網路話語的總體印象。在具體分析時，網易新聞有「貴州畢節5名兒童垃圾箱內死亡」專題，該專題跟帖數量比較龐大，網易新聞專題的跟帖是本文的分析對象之一。在留守兒童自殺事件中，鳳凰網資訊做了專頁報導引起了較多跟帖，天涯論壇關於這一事件的討論也獲得較多關注，還有網易新聞《貴州畢節留守兒童之殤》的跟帖也比較多。本文在分析這一事件時以這三家互聯網站作為資料來源。在具體分析時，也是先整體流覽，然後重點分析獲得較多認可的帖子。

底層「痛苦」與媒體框架

「痛苦」本是一種純個體的情感體驗，必須經由語言的中介，「痛苦」才能夠進入公共空間，從私人的情感變為公共的情感。媒體在「痛苦」的客體化或公共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媒體如何講述「痛苦」也塑造著公眾的情感和認知。這一部分我們主要分析媒體對畢節留守兒童事件的報導。本部分主要分析話語主體(誰在講述痛苦)、歸因(痛苦因何而起)、行動指向(如何消除痛苦)。

媒體話語框架

《南方週末》與財新傳媒旗下的《財新週刊》(2015年第10期之前名為《新世紀週刊》)、《中國改革》等報刊在畢節留守兒童事件的報導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算得上是兩起事件的代表文本。2012年，5位流浪兒童垃圾箱中死亡事件發生後，《南方週末》做了〈從留守到流浪：他們的「好」生活〉的報導。文章講述了流浪少年夏雨的故事。沒有戶籍，住在城市的狹小得像一口小小的棺材的窩棚，每天賺20元，但在五個孩子死於垃圾箱事件發生後，一場搜救運動開始，夏雨被員警帶走送進畢節七星關區福利院。但由於母親離開、父親4年前獲罪入獄，沒有人認領夏雨，他只有繼續待在福利院，但福利院的環境讓他決定早晚要繼續離開。文章還敘述了一位被父親送出去流浪的兒童郭成。文章反思的問題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社會資源配置不均衡、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城鄉公共服務的不均等、住房制度等一系列轉型時期的問題(范承剛、習宜豪、賀風玲，2012)。

2012年第46期的《新世紀》週刊(後改稱《財新週刊》)報導了《五個少兒的生與死》，開篇寫道：「生於貧困，死於鬧市街頭的垃圾桶。與賣火柴的小女孩如出一轍的悲劇——這是另一中國。」(王婧，2012年11月)這篇文章詳細地描繪了這幾位兒童的家庭、流浪的生活以及流浪兒童問題反復上演的問題。文章的作者、財新記者王婧還在博客上寫了多篇採訪手記：《第三世界：死於垃圾箱》、《他們需要比垃圾桶更好的家》等文章。在2015年留守兒童自殺事件之後，《財新週刊》又做了《畢節留守兒童之殤》以及胡舒立的評論。前篇文章講述了這四位自殺兒童貧困的鄉村、破碎的家庭，並稱「一切都像是三年前的重演。」(王婧，2015)胡舒立的評論則指出應該採取的改革，比如戶籍改革、加大鄉村教育等(胡舒立，2015)。

那麼，媒體是如何呈現這兩起事件的？我們從「歸因」、「話語主體」、「行動指向」三個方面，梳理了主要報紙對畢節留守兒童事件的呈現，需要說明的是表一並沒有梳理所有的「歸因」、「話語主體」、「行動指向」話語，而是簡要呈現了主要報紙具有代表性的話語：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表一 主要報紙對畢節留守兒童事件的呈現

事件原因	話語主體	行動指向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	流浪兒童	取消戶籍制度
社會資源配置不均衡	貴陽市流浪兒童 救助保護中心副主任	多層次的行動 全方位的改革
住房制度	貴州大學研究生余丹	破除農民進城障礙
戶籍制度	畢節市赫章縣河鎮鄉 發達村羅貴亮	加大鄉村教育投入
土地制度	上海交通大學 公共經濟與社會政策系教授	借助社會組織力量
城鄉公共服務不均衡	警方	

首先，在話語主體上，我們可以看出媒體呈現的話語主體是比較多元的。媒體把不同主體連結在一起。但縱觀大陸媒體的報導，「底層」較少成為「痛苦」表達的主體。這既與「痛苦」的難以表達、底層的「痛苦」表達能力有關。但更主要的原因則是新聞生產以及結構層面的權力不平等，導致底層群體很少有進入媒體發言的機會。由於缺乏當事人自己的「講述」，有可能導致媒體關於他人痛苦的塑造傾向於同樣的模式，所有的災難看起來都一樣，讓人們覺得曾經見過這樣的故事，這也會造成「同情疲勞」(Moeller, 1999, p. 13)。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底層能夠作為話語主體出現在一些新聞報導中，往往也是在新聞發生之初。在新聞事件的後期，往往少見「底層」。在後期的新聞報導中，圍繞著問題的解決、處理和對策建議，政府機構、知識精英成為主體。

其次，在媒體對底層「痛苦」的歸因上，我們可以看到「戶籍制度」、「資源不平衡」、「公共服務不平衡」、「家庭缺失」等都被視為畢節留守兒童自殺的原因。在這些歸因背後是關於當代中國底層「痛苦」的知識生產，「痛苦」被與社會公平正義、制度等議題連接起來，媒體建構了一種「非正義的框架」(injustice frame)，這一框架可以產生憤怒的情感(Jasper, 2011, p. 289)。這種框架也在塑造公眾的認知，我們在下文關於互聯網的分析中將會看到，人們對底層「痛苦」的感知直指對政治和社會的憤怒和批判。同樣，在媒體所指向的「行動」上，政府、制度、資源配置等都成為變革的願望。

「痛苦」的呈現方式

「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別人只是推測」，維特根斯坦這樣寫道（維特根斯坦，2005；轉引自韓瑞，2013：254）。維特根斯坦意思是說疼痛體驗的不可言說性。但我們都在努力地表達自己的「痛苦」或他人的「痛苦」，試圖將非語言的「痛苦」語言化，在這一過程中，隱喻、場景的描述不可缺少。韓瑞指出，「疼痛正是通過隱喻進入語言當中。（想像的或者真實的）疼痛的工具，通過塑造一種導致疼痛原因的具體場景，將疼痛的『無法共用』的、非語言的體驗表達出來，並將之客體化」（韓瑞，2013：68）。疼痛的表達需要「代理者的語言」（language of agency），即疼痛的外部代理者。媒體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代理者的語言」，都會影響人們對「痛苦」的體驗。一則簡短的消息和一篇呈現留守兒童生活場景的調查報導，顯然擁有不同的塑造公眾同情的效果。一篇報導是否使用圖片、如何使用圖片，也是不同的呈現方式，動員的效果也有很大差異。

在畢節留守兒童事件中，「代理者的語言」包括垃圾箱、遺書、凌亂的屋子、破碎的家庭、破舊的沙發等，也包括一些比喻的使用，比如「賣火柴的小女孩」。通過這些「代理者」，人們能夠體驗到留守兒童的「痛苦」。比如，在「五個少兒的生與死」中，記者王婧寫道：「第一個垃圾箱，裝有一半垃圾。83歲的拾荒老人孫慶英揀出兩個礦泉水瓶。第二個垃圾箱，沒什麼可挑揀。第三個垃圾箱，蓋子是合上的。老人用小鋤頭打開蓋子，一股熱氣撲面撲來。垃圾桶裏沒有垃圾，卻有五個孩子，整齊地躺著，一個抱著一個」，並把這一事件類比為「賣火柴的小女孩」。這樣一種呈現垃圾箱、垃圾和孩子的場景能夠產生情感上的震撼。「代理者的語言」是連接底層痛苦與公眾的橋樑，是讓底層痛苦獲得其他階層「理解」的主要通道。媒體能夠創造和使用多少「代理者的語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有多少的底層痛苦能夠進入其他階層的生活世界。但無論是畢節留守兒童事件還是其他與留守兒童相關的議題，表達疼痛的「代理者的語言」都是很貧乏的，使用「代理者的語言」的媒體報道也是偏少的，這一狀況應該與階層不斷分化的社會結構有很大關係，階層之間加劇的分化阻礙了「同情」（empathy）跨階層的運作。

公眾的「被痛苦」、「同情」及其結構

本部分關注這兩起事件引發的公眾「同情」。兩起事件具有的「道德震撼」引發了公眾的「同情」。「同情」感往往會轉化成其他的情感，這些情感構成了「同情」結構的第一個議題。如前所述，公眾對「同情」以及相關情感的表達常常蘊含著公眾對事件的認知和判斷，在此意義上，情感的表達可以被視為以某種話語框架組織起來的公共討論，這是本文分析的第二個議題。公眾的「情感」表達會徵引一些文化資源、道德資源或話語資源，公眾的「情感」話語與其他話語構成「互文」關係，情感表達的這些資源是本部分希望探討的第三個議題。

同情感的結構

根據網民的回帖，在這兩起事件中，網民的同情感主要包括以下五種情感：

I. 悲痛(sorrowful)

這一情感主要是看到畢節留守兒童的遭遇而產生的悲傷哀痛，網民通過發帖強調自己的「被痛苦」，這種「被痛苦」的體驗能夠激發網民的討論，「對他者『痛苦』認知的另一面則是對自身『被痛苦』的強調，而自身的這種有意識『被痛苦』更能激發起本國民眾對於他者『痛苦』的排拒情緒」(袁劍，2011：59)。縱觀網路跟帖，有不少關於「悲痛」情感的表達：

首先是小孩子的父母，其次是當地政府的不作為，活活的間接的害死了四個孩子，可憐啊，小孩子無力抗爭，到了最後就想到死，看了難受想哭。(張家五姐[廣東省廣州市網友])

心痛不已，淚水忍不住的往下掉。曾經做了8個多月的留守兒童的我，此刻難以平靜。那種孤獨，害怕，無助的感覺伴隨了我很多年，直到現在我仍然很害怕一個人。以後無論生活多麼艱難，我也絕對不會把我的孩子獨自留在家裏。但願類似的事情不要再發生了。(網易福建省廈門市網友，ip: 211.162.*.*)

「底層」痛苦、公共表達與「同情」的政治

我們天天說綜合國力如何如何強大了，但在一些偏遠地區還是那麼落後貧窮，真的很令人心酸悲痛！想想我們的孩子，特別是那些養尊處優而不懂感恩的人們，該付出一些了！關鍵是從國家層面應改變一些落後地區的貧窮和教育現狀！（網易山東省泰安市網友，ip: 60.213.*.*)

看到孩子的遺言心都碎了！父母的，親戚的，鄰居的，社會的冷漠讓尚未懂事的孩子選擇離開這個對他們來說冰冷的世界。我們做了什麼？我們打造了怎樣的冰冷，讓我們的未來如此決然！（[上海市網友]

II. 憤怒 (angry)

「憤怒」是網民在看到畢節留守兒童「痛苦」之後的主要情感反應。它往往有著明確的意向對象，網民憤怒的對象包含從留守兒童父母到地方政府再到整個中國社會的諸多層次。憤怒的表達指向對中國社會諸問題激烈的批判甚至「討伐」，有的還挑戰政治的合法性：

我TM的出離憤怒了，中國所謂最神秘的「相關部門」，你TM的在哪裏，在哪裏，在哪裏？？？(ainikuangbiao [網易四川省成都市網友])

他們是推翻了一個舊社會，可是，也沒有建立一個更好一點的新社會，甚至更爛！他們有什麼資格，有什麼臉還來「管理」、霸佔這個國家(lightindark [網易上海市網友])

III. 諷刺 (satire)

「諷刺」是一種重要的網路實踐 (Yang & Jiang, 2015)。哈琴 (2010) 認為話語共同體對於人們如何理解反諷具有重要的影響。也就是說，諷刺是植根於特定的文化情境，與文化情境之間產生互文關係，離開了對這一文化情境的理解，人們不一定能夠理解諷刺的內容。在畢節留守兒童事件中，網友也大量使用諷刺的手法：

「可惜，還沒等到記者問你幸福嗎？」(朱雀火羽 [網易遼寧省瀋陽市網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2012年，中央電視台在中秋節和國慶日前夕推出《走基層百姓心聲》的特別調查節目「幸福是什麼」，記者採訪了各行各業的工作者，問的問題是「你幸福嗎？」這一問題也遭遇到各種帶有調侃味道的「神回答」，「你幸福嗎」也迅速在網上流行開來。在舉節事件中，被網友用來表達諷刺。也有網民用「新聞聯播」進行諷刺，並獲得了許多網民的認可和對話：

哥要連續看兩月的新聞聯播才能平復此刻的悲傷……(達摩斐
[網易廣東省惠州市網友])

《新聞聯播》是中央電視台最重要的新聞節目，每期半小時長度，關於國內事件以正面宣傳為主，之前曾在網上被調侃說《新聞聯播》前十分鐘是「領導很忙」，中間十分鐘是「國人很幸福」，最後十分鐘是「外國人很痛苦」。網民的這一帖子既表達對《新聞聯播》的諷刺，也表達對留守兒童事件的痛心。

IV. 羞愧 (shame)

羞愧的情感在這兩起事件中並不多見，僅有的表達羞愧情感的帖子指向「我們」的責任。

這是全體文明人共同的恥辱。不是政府單獨的責任，也是我他的責任。我們都有責任拯救他們，我們都麻木不仁了，我們都袖手旁觀了，我們都吝嗇四壁之內的空間、碗裏的食物和口袋裏的錢財了。(slowest [網易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網友])

V. 無力感 (powerless)

無力感表達的是對自己幫助留守兒童或推動相關政策變革的無能感。在這兩起事件中，無力感也並不多見，遠遠低於憤怒、悲痛和諷刺三種「同情」形式。只有極少數網民表達了面對留守兒童事件的無力：

揪心的痛。可憐的孩子，突然感覺到很無助，願你們在天堂過的好。(xonvi [網易廣東省汕頭市網友])

「底層」痛苦、公共表達與「同情」的政治

我們在分析了中國公眾同情感的結構之後發現，在Höjjer劃分的「同情」的四種形式中，留守兒童事件中的中國網民主要是第一種和第二種，第一種強調自己的悲痛，第二種以憤怒和諷刺為主。而很少有網民強調自己的羞愧感，很少強調自己的義務。我們前文論述過在Ong關於階級分化的菲律賓的研究中曾經指出的電視受眾對「苦難」報導的反應，中國網民的「同情」背後是否也有類似的心理，尚需進一步的檢驗。但可以推測的是，這樣一種「同情」結構很有可能帶來這樣一種結果，即一方面對制度、政府、家庭進行強烈的批判，但另一方面自己又不願意付出關懷的行動。

「情感」的話語框架

「情感」的表達與公眾對該事件的認知有關，在情感的表達背後也蘊含著認知(理性)的因素，因此，理解公眾的情感，我們需要考察公眾情感表達的話語框架。在畢節留守兒童事件中，公眾情感表達的話語框架主要包括「制度框架」、「社會貧富問題框架」、「政府責任框架」、「家庭責任框架」。

I. 制度框架

在這一框架下，網民將事件歸因於制度層面的問題，表達對現有制度的憤怒，呼籲制度變革，有的指向戶籍制度，有的指向各種不平等的制度。

沒辦法，為了養家糊口只能背井離鄉務工，可是殘忍不平等的戶籍制度，只能被迫分離。(@別了還來61樓)

這是全社會的責任，各種不健全不平等的制度，和人情的冷漠導致了這慟天的悲劇。如果社會能因此而進步，制度能因此而改變，我們應感謝這些可憐的孩子，作為制度的犧牲品他們也許能為將來的孩子們換來更多的保障，但這是生命的代價，如此大的犧牲如果還不能換來制度定制者的警醒。(做夢的牛 [網易北京市網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可憐的小孩子，要是不出生在中國多好，萬惡的計劃生育和戶籍制度，為了從這些可憐的人身上榨取金錢利益，計劃生育不給上戶口才上不了學，連做人的權利都沒有，就只有到處流浪。
(網易雲南省德宏州網友，ip: 112.113.*.*)

II. 社會貧富問題框架

這一框架主要是指網民將事件歸因於社會貧富問題，表達對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滿和嘲諷。

這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啊，為了讓數據好看，不斷的被平均。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網易廣西南寧市網友，ip: 171.36.*.*)

有感畢節4名留守兒童疑喝藥自殺，窮得只吃玉米！這個社會真好啊！先富得幫助了沒富的！他們做的真好！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都不是人沒點愛心！就會搞貧富差距！（jiuyaoshuo [網易江蘇省南京市網友]）

教科書裏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想想那些天天錦衣玉食中成長的官二代、富二代和這些吃垃圾而死的孩子，睡垃圾箱被燒死的孩子，我欲哭無淚。難道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優越性嗎！（作者：4301040221）

社會悲劇，要反思的是這個兩極分化的社會。(去無風 [湖北省武漢市網友])

III. 政府責任框架

使用這一框架的網民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地方政府的不作為、官員的貪污腐敗。

只要官猿們都少貪一點點，畢節就變成美好的人間……(海歌935 [網易上海市網友])

地方政府的領導們，你們不覺得丟人嗎。(老狼591 [網易山西省晉城市網友])

「底層」痛苦、公共表達與「同情」的政治

IV. 家庭責任框架

這一框架主要出現在2015年畢節留守兒童自殺事件中。在這起事件的討論中，不少網民認為事件的原因是留守兒童父母的「生而不養」，指責其父母的缺位。

父母為了生存外出打工固然無可厚非，但長期把五名孩子留守在家讓其自生自滅也太不負責任了！（網易雲南省網友，ip: 183.224.*.*）

痛心！孩子的父母責任最大，生而不養！（黃河岸邊純真歲月 [浙江省寧波市網友]）

「同情」表達的話語資源

我們發現，網民在表達「同情」的時候，常常徵用一些文化資源或話語資源。這些資源有不同的來源，大致可以劃分為：

I. 傳統話語資源

傳統話語資源是網民徵用最多的。中國傳統文化裏留下了一些與窮人的痛苦有關的資源，這些資源也塑造了中國人看待類似事件的認知模式。在這兩起事件中，唐代詩人杜甫的詩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成為網民徵用最多的文化資源。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鳳凰網跟帖，cgp196 [浙江省杭州市網友]）

這樣的事，還會繼續發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因為這就是一個人吃人的時代。（代表我自己 [其他地區網友]）

現實版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pjm19721023 [重慶市網友]）

此外，丹麥作家安徒生的著名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在中國也非常知名，它也被用來比喻畢節留守兒童垃圾箱死亡事件：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西方有賣火柴的小女孩，東方有兒童垃圾箱裏取火！！(一縷風清雲淡 [網易廣東省深圳市網友])

想起了這個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和諧社會從薪開始 [網易雲南省昆明市網友])

以前我以為安徒生是丹麥作家，現在才知道是原來中國作家。(禾愚 [網易廣西南寧市網友])

還有雨果的《悲慘世界》也成為網民徵用的資源：

雨果要是生活在這神奇的土地上，估計就不好意思把他的小說叫悲慘世界了～(生活大爆炸謝耳朵 [網易四川省樂山市網友])

圍繞《悲慘世界》的隱喻，網民之間也有互動：

考察過拆那馬上把他的小說撕了，重新寫一本《這叫TMD什麼世界！》(網易北京市海澱區網友，ip: 114.246.*.*)

II. 官方話語資源

如前所述，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做出了許多承諾，大眾傳媒徵引官方話語往往出於規避政治風險的考量，但在網路空間中，網民對官方話語的徵引則主要是用來諷刺和批判，表達憤怒。在畢節留守兒童事件中，官方話語成為網民徵引較多的話語資源。

這是科學發展觀的特色(www125 [湖北省武漢市網友])

我們的祖國是花園，花園的花朵多鮮豔。五個自殺的孩子，是唱著這首歌，停止的抽搐(gs007 [河北省石家莊市網友])

請問央視記者：你覺得這幾個小孩幸福嗎？(3鹿好奶 [網易四川省達州市網友])

某主義核心價值觀(keiwo [網易上海市閔行區網友])

通過這一部分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留守兒童事件中的公共「同情」擁有多元的情感形式、話語框架和文化資源。作為一種道德情感，「同情」指向中國情境的政治倫理、公平正義，具有公共意義。最後，

「底層」痛苦、公共表達與「同情」的政治

我們還需要考察一下網民「遠離」(distantiation)同情的策略。並不是所有的網民都在此事件中表達同情，Höijer曾經指出受眾「遠離」同情的幾種策略，一種是拒絕媒體關於「真實」的宣稱，認為媒體製造了扭曲的圖像，過於關注暴力和人類痛苦。還有一種是採用「我們—他們」的視角(us-them perspective)，把遭受苦難的人們「非人化」(dehumanized)，認為他們是和「我們」完全不同的文化，不同情也就被合法化(Höijer, 2004, pp. 524–525)。

在這兩起事件中，沒有見到認為留守兒童不值得同情的表述。但留守兒童的父母卻在一些帖子中被認為不值得同情。網易《人間》曾發表過《畢節五少年垃圾箱死亡之後》的調查報導，獲得上千跟帖，這篇文章描述的是2012年留守兒童事件之後三個家庭的故事。在跟帖中，有網民回帖說「好吃懶做是他們的本性，國家給他們再多的錢也沒有什麼卵用，其實國家應該把錢用在教學上，下一代才有希望。」(網易中國手機網友)也有網民說「這個還真不好說，聽說四川大涼山的貧窮的彝族，你給他們發錢，轉眼就買酒買煙用光了。這是觀念問題。越落後的地區，人的觀念越差勁。餓是餓不死，但是發家致富只是在酒醉後的夢裏出現。」(huxin009 [網易湖南省邵陽市手機網友])在這樣的一些表述中，我們看到以留守兒童父母為代表的群體被置於與「我們」的文化不同的位置，由此「痛苦」就被認為是應得的。這種策略是本案中網民主要的「遠離」同情的策略。

權力結構、「同情」政治與公共表達

本文主要分析了媒體對留守兒童「痛苦」的呈現方式與公眾的「同情」感。「痛苦」是不同階層之間的心靈紐帶和連接紐帶。留守兒童的「痛苦」所引發的「道德震撼」將不同的階層連接起來。畢節留守兒童事件中，媒體塑造了關於「痛苦」的公共性框架，指向戶籍制度、家庭責任、政府責任、貧富差距等公共議題，個體的「痛苦」被賦予公共價值。留守兒童的「痛苦」引發了公眾的同情，中國網民的同情感主要由悲痛、憤怒和諷刺構成，在對自身「被痛苦」的強調中，公眾表達了對戶籍制度、政府作為、家庭、貧富差距等問題的憤怒和諷刺，甚至還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有各種觀點之間的辯論。這說明「同情」這種情感與公共理性並不是對立的，它不僅是公共討論的推動者，其自身的一些觀點表達也能達到公共性的目標，「娛樂也好，社交也罷，其中都可以包含嚴肅公共議題，甚至達到用傳統『理性』手段無法達成的公眾效果」(邱林川、苗偉山，2016：18)。這是我們試圖超越「情感—理性」二元對立框架的初步嘗試。

本文也分析了公眾表達「同情」時所徵引的文化資源和話語資源。傳統文化中關於「痛苦」的描述在互聯網中塑造了網民對於「痛苦」的想像，是人們感知「痛苦」的重要文化模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獲得最廣泛的引用。官方的話語和「承諾」成為網民藉以批判和諷刺現實的資源。這兩種資源與傳統的政治倫理、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構成「互文」關係，深刻地塑造著中國公共領域中的話語形態和政治文化。這也說明「公共領域」的建構以及人們的公共表達植根於各類文化資源和道德資源之中。Madsen建議在討論公共領域、市民社會的時候應該關注文化和道德維度。在中國，我們需要瞭解眾多新興群體內部的道德資源(Madsen, 1993)。這些文化和道德資源塑造了人們的交往關係。本文也是對公共領域建構中的文化和道德資源問題進行的回應。網民作為伴隨互聯網技術而出現的新興群體，其內部各種文化和道德資源交織，錯綜複雜，其對公共商議、公共領域的影響尚需更多的探討。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地反思權力結構的影響。一個社會的權力結構會塑造媒體和公眾的「同情」。正是不平等的權力結構導致底層「痛苦」的表達面臨諸多困境和問題。首先，權力結構的不平等以及底層群體在表達能力上的局限，使得底層群體自身難以在公共空間中表達自己的「痛苦」，相比較而言，中產階級以及上層群體則擁有更多自我表達的空間資源和能力。這導致底層「痛苦」的表達依賴於媒體的發現。

其次，儘管這兩次事件都引起了媒體和公眾的大量關注，但整體來看，留守兒童「痛苦」進入公共空間的機會是非常有限的，受到國家政策、媒介組織的新聞生產等方面的影響。有研究分析了2001–2011年之間的留守兒童報導，研究發現，最早是2001年，只有一篇報導，2006年最多，有52篇。原因在於2006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

「底層」痛苦、公共表達與「同情」的政治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10月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陳世海等，2012) 留守兒童進入公共空間受到國家議程的影響，並且許多留守兒童的報導是偏向於呈現國家的關懷，而非「痛苦」敘事。在新聞生產方面，有研究揭示，即使面臨同樣的問題和災難，由於不同群體擁有不同的社會資本，他們獲得媒體關注的機會也相差很大。例如同樣面臨垃圾焚燒和PX項目可能帶來的風險，廣州番禺垃圾焚燒廠和李坑垃圾焚燒廠、廈門PX和漳州PX在獲得媒體關注上是有很大差別的(夏倩芳、袁光鋒、陳科，2012)。

第三，政治不平等和底層群體表達管道的缺失帶來階層之間的隔膜，長期關注畢節留守兒童的記者王婧在一篇日誌中說：「作為一名長期做社會新聞的記者，也算是經常上山下鄉了，但我真的從沒見過這麼窮的地方。我一半真心一半撒嬌地對編輯說，這鬼地方，我再也不想來了。他說，中國有三個，第一世界的中國，第二世界的中國，第三世界的中國。很不幸，你直接從第一世界到了第三世界。我也覺得，我一定是穿越了。」(王婧，2012年11月23日) 不少記者應該都有王婧的這種體驗。這種隔膜有可能阻礙媒體對底層「痛苦」的感受。

在政治權力不平等的結構中，底層「痛苦」激發的媒體同情和關切是比較微弱、短暫和偶然的。其一，底層「痛苦」面臨著公眾「同情疲勞」的問題。桑塔格曾說，「照片創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縮」(Sontag, 2003, p. 105)。與此同理，媒體創造了多少同情，也就有可能使得多少同情萎縮。一旦媒體賦予底層「痛苦」以更多的可見性，就有可能同時造成公眾的「同情疲勞」，導致只有更劇烈的「痛苦」才能獲得媒體和公眾的關注。目前來看，較之以前，現在底層「痛苦」獲得的公共「同情」是更為微弱的。其二，與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相比，由於底層群體較為缺乏自我表達能力和資源，因此，底層「痛苦」難以長久地留在公共空間，更依賴於媒體和知識精英的發現。但由於社會排斥和政治不平等的存在，不同階層之間處於隔膜甚至「斷裂」的狀態，導致媒體和知識精英對底層「痛苦」的發現有著諸多「偶然」的因素，並難以對底層保持持續的關注和產生持久的「同情」感。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儘管一些「道德震撼」的事件能夠吸引媒體和公眾的注意，但這種突發的「同情」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留守兒童在公共空間中的弱勢地位。本文認為，圍繞造成底層「痛苦」的結構性原因和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共情共識關係並不是穩定的。

對公眾情感的分析，還需要引入階層分析的視角。「公眾」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在使用這一概念時，本文是將其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來使用的。但在現實中，「公眾」並不是統一的整體，對「公眾」的界定離不開階層身份。階層身份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某一階層的「公眾」對周身世界的想像和價值評判，也塑造了其情感的結構。借助階層的視角，我們就需要更細緻地討論一個階層如何感受自己階層的「痛苦」，又如何感受其他階層的「痛苦」，是產生「同情」還是冷漠，公眾「同情」是否可以促進社會團結還是加劇階層斷裂。在中國情境中，我們在多起案例中看到錯綜複雜的景象，例如在一些案例中底層的「痛苦」引起了不同階層的關注，促進了社會團結，但另一些案例則沒有；中產階層或上層群體的「痛苦」有時激發互聯網上的「同情」，有時引發的是冷漠乃至「幸災樂禍」。甚至一起案例的不同階段還有情感的「反轉」。比如一些醫患衝突事件中公眾對「醫生」的情感、一些城管小販衝突事件中公眾對「城管」的情感。這背後的情感機制和情感轉換機制到底為何？這些問題都尚需更進一步的分析，但由於本文對網民的分析主要是來源於互聯網文本，我們無法確定網民的階層身份，因此在這些問題的探討上留下了遺憾。

本文試圖超越「情感—理性」的二元對立邏輯，探討媒介和「同情」的問題，當然這只是一個初步的探討，還留下許多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議題。(一)為了更深入和全面地理解公眾「同情」的政治，我們需要擴大議題的範圍和研究群體的範圍，例如在諸如災難事件、司法事件、普通社會事件等不同的公共議題中，公眾的同情感結構和表達的文化資源有著什麼樣的差異。對於小販、流浪者、農民工、留守兒童、下崗失業群體、農民等不同群體，媒體和公眾「同情」是否有差異，為何有差異。這些研究都需要我們採取更多元的案例、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來解釋。(二)我們還需要把「同情」以及其他情感放在新聞生產過程

「底層」痛苦、公共表達與「同情」的政治

中探討。在新聞生產中，記者是如何表達「同情」的，是如何看待「同情」價值的，又是如何進行「情感管理」的，尤其是在自然災難和社會災難議題上，記者的「情感管理」有何差異。(三)我們還可以把歷史的視角納入進來，例如討論歷史中的文化資源、道德資源、革命資源是如何塑造公眾情感的，又如何在當代中國公共領域中被借用的。這能夠呈現公共領域建構的複雜性。(四)公眾「遠離」同情的策略也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公眾認為什麼群體值得同情、什麼群體不值得同情、公眾的理據是什麼，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會、文化和政治建構的結果。對以前議題的討論，會豐富我們關於中國互聯網、公共空間、政治文化等諸多問題的理解。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Manthey, E. (2011)。《感受他人的痛：媒體對遙遠的苦難的呈現——個案探討：分析英國媒體對四川地震與卡崔娜風災的報導》。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論文。
- Manthey E. (2011). *Ganshou Taren de tong: Meiti dui yaoyuan de kunan de chengxian—Ge'an tantao: Fenxi Yingguo meiti dui Sichuan dizhen yu Kacuina fengzai de baodao*. Fudan daxue xinwen xueyuan shuoshi lunwen.
- 王婧 (2012年11月23日)。〈五個少兒的生與死〉。《財新週刊》，2012年第46期。上網日期：2015年9月23日，取自財新網，<http://china.caixin.com/2012-11-23/100464478.html>。
- Wang Jing (2012, November 23). Wuge Shaoer de shengyusi. Retrieved from <http://china.caixin.com/2012-11-23/100464478.html>.
- 王婧 (2012年11月23日)。〈第三世界：死於垃圾箱〉。上網日期：2015年9月23日，取自<http://wang-jing.blog.caixin.com/archives/49148>。
- Wang Jing (2012, November 23). Disan shijie: Siyu lajixiang. Retrieved from <http://wang-jing.blog.caixin.com/archives/49148>.
- 王婧 (2015年6月)。〈畢節留守兒童之殤〉。《財新週刊》，2015年第24期。
- Wang Jing (2015, June). Bijie liushou ertong zhi shang. *Caixin zhoukan*, 24.
- 中國廣播網 (2012年11月26日)。〈畢節5名男童在垃圾箱內中毒死亡 暴露監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 管多重缺失)。上網日期：2016年10月28日，取自http://www.cnr.cn/cehua/week/121126/201211/t20121124_511402822.html。
- Zhongguo guangbowang (2012 November 26). Bijie 5 min nantong zai lajixiang nei zhongdu siwang Baolu jianguo duochong qeshi. Retrieved from http://www.cnr.cn/cehua/week/121126/201211/t20121124_511402822.html.
- 左稀(2013)。〈情感與認知——瑪莎·納斯鮑姆情感理論概述〉。《道德與文明》，第5期，頁135–142。
- Zuo Xi (2013). Qinggan yu renzhi—Masha Nasibaomu qinggan lunshu gaishu. *Daode yu wenming*, 5, 135–142.
- 休謨(1980)。《人性論》(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Xiumo (1980). Renxing lun (Guan Wenyun,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iguan.
- 邱林川、苗偉山(2016)。〈反思新媒體事件研究：邱林川教授訪談錄〉。《國際新聞界》，第7期，頁11–23。
- Qiu Linchuan, Miao Weishan (2016). Fansi xinmeiti shijian yanjiu: Qiu Linchuan jiaoshou fangtanlu, *Guoji xinwenjie*, 7, 11–23.
- 林郁沁(2011)。《施劍翹復仇案：民國時期公眾同情的興起與影響》(陳湘靜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Lean, E. [2007].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n Yuqin (2011). *Shi Jianqiao fuchou an: Mingguo shiqi gongzhong tongqing de xingqi yu yingxiang* (Chen Xiangjing, Trans.).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Lean, E. [2007].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莎倫·R·克勞斯(2015)。《公民的激情：道德情感與民主商議》(譚安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Krause, S. [2008]. *Civil passions: Moral sentiment and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alun Kelaosi (2015). *Gongming de jiqing: Daode qinggan yu minzhu shangyi* (Tan Ankui,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rause, S. [2008]. *Civil passions: Moral sentiment and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吳介民、李丁贊(2005)。〈傳遞共通感受：林合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台灣社會學》，第9期，119–163。
- Wu Jiemin, Li Dingzan (2005). Chuandi gongtong ganshou: Linhe shequ gonggong lingyu xiuci moshi de fenxi. *Taiwan shehuixue*, 9, 119–163.

「底層」痛苦、公共表達與「同情」的政治

- 胡舒立 (2015年6月29日)。〈莫讓留守兒童悲劇重演〉。《財新週刊》，第25期。上網日期：2015年9月23日，取自財新網，<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6-29/100823416.html>。
- Hu Shuli (2015, June 29). Mo rang liushou ertong beiju chongyan. Retrieved from <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6-29/100823416.html>.
- 袁光鋒 (2015)。〈公共輿論中的「同情」與「公共性」的構成〉。《新聞記者》，第11期，頁31–43。
- Yuan Guangfeng (2015). Gonggong yulun zhong de tongqing yu gonggongxing de goucheng. *Xinwen jizhe*, 11, 31–43.
- 袁光鋒 (2016)。〈「情」為何物？——反思公共領域研究的理性主義範式〉。《國際新聞界》，第9期，頁104–118。
- Yuan Guangfeng (2016). Qing wei hewu?—Fansi gonggong lingyu yanjiu de lixing zhuyi fanshi. *Guoji xinwenjie*, 9, 104–118.
- 袁劍 (2011)。〈中國的「痛苦」與西方的「被痛苦」：兩部作品勾起的記憶〉。《中國圖書評論》，第11期，頁58–62。
- Yuan Jian (2011). Zhongguo de tongku yu xifang de beitungkong: Liangbu zuopin gouqi de jiyi. *Zhongguo tushu pinglun*, 11, 58–62.
- 夏倩芳、袁光鋒、陳科 (2012)。〈制度性資本、非制度性資本與社會衝突性議題的傳播〉。《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2期，頁21–66。
- Xia Qianfang, Yuan Guangfeng, Chen Ke (2012). Zhiduxing ziben feizhiduxing ziben yu shehui chongtongxing yiti de chuanbo.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22, 21–66.
- 孫飛宇 (2007)。〈對苦難的社會學解讀：開始，而不是終結〉。《社會學研究》，130期，頁207–217。
- Sun Feiyu (2007). Dui kunan de shehuixue jiedu: Kaishi, er bushi zhongjie. *Shehuixue yanjiu*, 130, 207–217.
- 陳世海、詹海玉、陳美君、文四海 (2012)。〈留守兒童的社會建構：媒介形象的內容分析〉。《新聞與傳播研究》，第2期，頁45–51。
- Chen Shihai, Zhan Haiyu, Chen Meijun, Wen Sihai (2012). Liushou ertong de shehui jiangou: Meijie xingxiang de neirong fenxi.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2, 45–51.
- 郭于華 (2011)。《傾聽底層：我們如何講述苦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Guo Yuhua (2011). *Qinting diceng: Women ruhe jiangshu kunan*.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 琳達·哈琴(2010)。《反諷之鋒芒：反諷的理論與政見》(徐曉雯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原書Hutcheon, L. [1994]. *Irony's Edg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Iron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Linda Haqin (2010). *Fanfeng zhi fengmang: Fanfeng de lilun yu zhengjian* (Xu Xiaowen Trans.). Kaifeng: Hen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utcheon, L. [1994]. *Irony's Edg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Iron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程姝雯(2016年1月28日)。〈李克強：決不讓留守兒童成為家庭之痛社會之殤〉。《南方都市報》，第AA17版。
- Cheng Shuwen (2016, January 28). Li Keqiang: Jueburang liushou ertong chengwei jiating zhitong shehui zhishang. *Nanfang dushibao*, AA17.
- 楊國斌(2009)。〈悲情與戲謔：網路事件中的情感動員〉。《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九期，頁39-66。
- Yang Guobin (2009). Beiqing yu xixue: Wanglu shijian de qinggan dongyuan.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9, 39-66.
- 新華網(2012年11月20日)。〈貴州畢節多名官員因5名男童悶死事件被處理〉。上網時間：2016年9月20日，取自網易新聞，<http://news.163.com/12/1120/10/8GOE8RBS00014JB5.html>。
- Xinhuaawang (2012, November 20). Guizhou Bijie duoming guanyuan yin 5 ming nantong mengsi shijian bei chuli. Retrieved from <http://news.163.com/12/1120/10/8GOE8RBS00014JB5.html>.
- 裴宜理(2001)。〈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李寇南、何翔譯)。《中國學術》，第4期，頁97-121。
- Pei Yili (2001). Chongfang Zhongguo geming: Yi qinggan de moshi (Li Kounan, He Xiang, Trans.). *Zhongguo xueshu*, 4, 97-121.
- 范承剛、習宜豪、賀風玲(2012年12月6日)。〈從留守到流浪：他們的「好」生活〉。《南方週末》，上網日期：2016年10月28日，取自<http://www.infzm.com/content/83635>。
- Fan Chenggang, Xi Yihao, He Fengling (2012, December 6). Cong Liushou dao liulang: Tamende Haoshenghuo, *Nanfang zhoumo*. Retrieved from <http://www.infzm.com/content/83635>
- 潘忠黨(2006)。〈架構分析：一個亟需理論澄清的領域〉。《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期，頁17-46。
- Pan Zhongdang (2006). Jiagou fenxi: Yige jixu lilun chengqing de lingyu,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1, 17-46.

- 盧暉臨 (2006)。〈集體化與農民平均主義心態的形成〉。《社會學研究》，第6期，頁147-163。
- Lu Huilin (2006). Jitihua yu nongmin pinjunzhuyi xintai de xingcheng. *Shehuixue yanjiu*, 6, 147-163.
- 韓瑞 (2013)。《假想的「滿大人」：同情、現代性與中國疼痛》(袁劍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Hayot, E. [2009]. *The Hypothetical mandarin: sympathy, modernity, and Chinese Pa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n Rui (2013). *Jiexiang de Mandaren: Tongqing, xiandaixing yu zhongguo tengtong* (Yuan Jian, Trans.).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ayot, E. [2009]. *The Hypothetical mandarin: sympathy, modernity, and Chinese Pa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oltanski, L. (1999). *Distant suffering: Morality,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o, Y. E. (2009). *The politics of suffering in the public sphere: The body in pain, empathy, and political spectacl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owa, Iowa. Retrieved from <http://ir.uiowa.edu/etd/936>.
- Chouliarakis, L. (2006). *Spectatorship of suffering*.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 Chouliarakis, L. (2008). The mediation of suffering and the vision of a cosmopolitan public. *Television & New Media*, 9(5), 371-391.
- Enomoto, C. E. (1999). Public sympathy for O. J. Simpson: The roles of race, age, gender, income, and edu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8(1), 145-161.
- Heins, V. (2007). Reasons of the heart: Weber and Arendt on emotion in politics. *The European Legacy*, 12(6), 715-728.
- Höijer, B. (2004). The discourse of global compassion: The audience and media reporting of human suffering.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6(4), 513-531.
- Jasper, J. M. (2011).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Twenty yea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7, 285-303.
- Kyriakidou, M. (2009). Imagining ourselves beyond the nation? Exploring cosmopolitanism in relation to media coverage of distant suffering.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9(3), 481-496.
- Link, B. G., Schwartz, S., Moore, R., Phelan, J., Struening, E., Stueve, A., & Colten, M. E. (1995). Public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liefs about homeless people: Evidence for compassion fatigu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3(4), 533-555.
- Madsen, R. (1993).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Modern China*, 19(2), 183–198.
- Moeller, S. D. (1999). *Compassion fatigue: How the media sell disease, famine, war and death*. New York: Routledge.
- Nussbaum, M. C. (2001).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ng, J. C. (2015). *The poverty of television: The mediation of suffering in class-divided Philippines*. London, UK: Anthem Press.
- Robertson, A. (2008). Cosmopolitanization and real time tragedy: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of the Asian tsunami. *New Global Studies*, 2(2), 1–25.
- Robertson, A. (2010). *Mediated cosmopolitanism: The world of television news*. Cambridge: Polity.
- Sontag, S. (2003).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Wahl-Jorgensen, K. (2013). The strategic ritual of emotionality: A case study of Pulitzer Prize-winning articles. *Journalism*, 14(1), 129–145.
- Yang, G., Jiang, M. (2015). The networked practice of online political satire in China: Between ritual and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3), 1–17.

本文引用格式

袁光鋒 (2017)。
〈感受他人的「痛苦」：「底層」痛苦、公共表達與「同情」的政治〉。
《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0期，頁203–236。